



儒学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摘要）

(2005-6-27 15:50:15)

作者：羊涤生

一、儒学在二十世纪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在儒学建立二千伍佰多年的历史中，二十世纪儒学的命运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进入高潮。在这个世纪里儒学的命运几经大起大落，尊孔、批孔、评孔交替出现，绵延不断，而且往往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兴衰与变革紧紧相连，因而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争论的范围，有时甚至形成了全民群众运动，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可谓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

如何理解和诠释这种特殊现象，我们必须从儒学本身的特点以及进入近代以来，儒学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种现象。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为己之学、安身立命之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它不仅是人生哲学，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几大人人类古文明中，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均已中断，希腊文化也被遗忘，只是到欧洲文艺复兴才又被重新发现。唯独只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而且在它的哺育下形成了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于欧洲，而人口是欧洲的数倍。它还基本不靠武力幅射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并且远渡重洋，经过传教士之手传播到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儒学自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成为国家政制的主要依据。这是总结了秦代单纯采用法家严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教训的必然转变。当然，所谓“独尊儒术”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统治者也懂得在阶级社会中单纯靠施仁政，以道德为中心，也是不可能维持其统治的。因此历来的统治者实际上也是儒法并用，即所谓“以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纪》）。并且一直采用商鞅和荀况等提出的“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这个国策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后，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且一直延续至清。所以王夫之读《通鉴》后，总结说：“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读通鉴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结构中，则主要是儒道互补。儒家以刚动入世为主，道家以柔静出世为主。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动静结合，以动为主，如钢筋混凝土一样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它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兼容并包，而又爱好和平与稳定，并且坚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多难兴邦”，从不绝望，适应性很强。虽然儒道两家，相反相成，起伏交替，互为消长，但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它超越文字手段，通过代代相传、潜移默化，深入到千家万户，穷乡僻壤，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以上这些在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有效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巩固和稳定了中国的中世纪农业社会。中国的中世纪社会是世界上最成熟、最发达的中世纪社会，它不仅广土众民，而且延续的时间是欧洲的一倍。但也有效地抑制和推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中国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和科技也是相当发达的，宋代铁的产量已达125000吨，相当于17世纪整个欧洲的产量（见《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P9-10）。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十五世纪以前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有人统计从公元前六世纪到1500年，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国也占二分之一以上。但以技术成果为主。中国在南宋和明中叶以后私人资本曾有较大发展，而且出现向产业资本发展的倾向，两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及价值观念与政策导向等非经济因素中断了这个进程。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没能在我国较早产生有许多原因，它牵涉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虽然我们有理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欧洲的中世纪不如中国发达和成熟，而且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想实现欧洲的统一，但始终没能成功，但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因此，以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文化与尚处于在农业社会阶段的中华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这就出现了“时代差”，西方人用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指南针和火药，制成了坚船利炮，远渡重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大国发生了严重危机，救亡和振兴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课题。中国被迫在内忧外患和亡国灭种的重重困扰和威胁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中国人必须在一个多世纪中走完西方人用几个世纪走完的历程。可谓紧锣密鼓，来去匆匆。在这种极为严峻和紧迫的形势下，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严重的困惑与失衡。中国既要经历中西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徬徨，又要经历古今分娩的阵痛。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要资本主义之利而不要资本主义之弊？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往何处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这个课题是如此重大，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又有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因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一次又一次的论争，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时起时伏，时隐时现，但却从未中断。一条主线，脉络清楚，贯彻至今，也许要贯彻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那么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学派对其所在的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认识过程，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和语言文字的障碍，这个过程往往是比较漫长的。中国对自己的固有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而且还要受到不同利益集团自觉不自觉的影响。这就是多次出现中西文化论争的直接原因。这与日本有所不同，儒家思想虽在日本影响也很大，但毕竟是外来文化，相对中国来说有取舍之便，比较容易完成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

返顾中国却必须经历由“言技（技术、经济）”“言制（政制）”“言教（思想文化）”的过程。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长技”内涵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如果说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属于言技阶段，那末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已到了“言制”阶段。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师法、俄、日；辛亥革命提倡民主共和、师法美、法，但都属政治体制的变革，康有为是“托古改制”，孙中山是“中西融合”，不同程度上都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儒家思想仍占重要地位。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尊孔与批孔

（一） 尊孔运动

中华民国建立后出现过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尊孔运动，并二次得到官方的支持。（内容略）

当时尊孔派中，虽然同属尊孔，但观点也不一致，如康梁尊孔但却“托古改制”主张维新变法；王先谦、苏舆、叶德辉等尊孔而反对维新，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为“背叛圣教，败灭伦常”；他们属尊孔派中的保守派，主张维持现状；“孔教会”尊孔，但也吸收了若干西方文化，在政体的主张方面也并不一致，“学衡派”尊孔，但因其中很多学者在西方留学归来，对西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主张“中西融合”。辜鸿铭长期在国外，深通西学，但又认为“西人之道不足法而其人学又不可不学”，他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西方文字，让西人了解中国文化。严复曾受过西方的严格教育，是近代思想家中最了解西学的人，猛烈抨击“守学义理”、“汉学考据”为“无实”、“无用”之学，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之说不可行，但晚年又认为“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与熊纯如书》）。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百日维新，并介绍了许多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并且相对而言梁比之于康对儒学有较多的批判，有的甚至相当严厉。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仍主张君主立宪，并与革命派论战。但辛亥革命后，康梁之学遂分，康支持复辟，恢复帝制，梁却既反对袁世凯称帝，又反对张勋复辟。梁1918年去欧洲旅游考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俄国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回国后他著“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认为孔子思想仍将发扬光大。严复、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与复古守旧的尊孔派不同，实际上是当时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映。

